

# 试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传播

李一平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 13-16 世纪时,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得以成功传播, 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原因, 同时也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完成的。经过 16 世纪伊斯兰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和发展, 伊斯兰教已遍及东南亚的主要岛屿, 并不断由沿海向内陆渗透, 从而奠定了今日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伊斯兰教; 东南亚; 岛屿地区; 传播

**中图分类号:** B969.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 (2005) 02-0070-06

在东西方的贸易交往中, 当新航路开通、欧洲人东来以前, 南洋群岛所产的香料, 作为欧洲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原先是经由穆斯林商人之手贩运去的。穆斯林商人在给东南亚的岛屿地区带来贸易的同时, 也带来了伊斯兰教。

“公元 7 世纪初, 阿拉伯的贸易船开始第一次穿过东南亚的海域。此后历千年之久, 为了寻求香料和药材, 阿拉伯贸易船继续经常来往于那些水域”。[1] 由此, 一个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商业转运中心——室利佛逝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赵汝适说, “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2] 中国载籍《新唐书》说: “诃陵, ……在南海中, ……至上元年(674—675 年), 国人推女子为王, 号‘悉莫’, 威令整肃, 道不举遗。大食君闻之, 资金一囊, 置其效, 行者辄避。如是三年。太子过, 以足躡金。悉莫怒, 将斩之。群臣固请, 悉莫曰: 而罪实本于足, 可断趾。群臣复为请, 乃斩指以徇。大食闻而畏之, 不敢加兵”。[3] 有人认为, 此大食可能位于苏门答腊西南海岸, [4] 表明伊斯兰教开始出现于印尼群岛的西部。现存东南亚岛屿地区已知日期最早的伊斯兰教遗址, 是一块发现于东爪哇的莱兰的穆斯林墓碑, 日期为伊斯兰教历 475 年(公元 1082 年), 但死者是一个名叫法蒂玛的非当地人的女性穆斯林。[5]<sup>(P218)</sup>

11 世纪中叶, 室利佛逝王朝开始衰落, 到 13 世纪已濒于解体。此时在苏门答腊北部建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须文达那——巴赛王国, 这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最早的立足点。据《马来纪年》记载, 该国的创立者摩罗悉楼(Mirah Silau), 是一名王室的后裔, 因其突发横财, 周围的人追随他而成为当地头人。莫罗悉楼的改教是源于阿拉伯商人谢赫·伊斯迈尔和南印度传教士苏丹穆罕默德的传教, 他建立起穆斯林国家, 改

收稿日期: 2005 - 04 - 13

作者简介: 李一平(1962 - ), 男, 湖南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号为苏丹·马利克·阿斯-萨利赫 (Saltan Malik As-Saleh), 贵族们也随之改信伊斯兰教。从此, 这个新国家的商业和人口都繁荣起来。[ 6 ] 这个苏丹的墓碑已被发现, 日期为伊斯兰教历 696 年 ( 公元 1297 年 ), 这是东南亚岛屿地区存在穆斯林王朝的第一个明确证据。

1292 年, 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意大利, 途经苏门答腊, 他在其游记中谈到八儿刺 (Perlak) 时说, “居住在港口城镇的人, 其中很多人受到常来贸易的撒拉逊商人的影响, 改信回教”, 其他“居民都是信奉佛教的”。[ 7 ] 1345 - 1346 年,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途经苏门答腊时, 见到当时的苏丹马利克·扎希尔, 认为“他是一位高尚大方的君主, 他信奉沙菲仪教派, 热爱法学家们, 并出席他们的讲学集会”, 而他的人民也都是沙菲仪教派穆斯林, 许多来自西亚的穆斯林学者聚集在这里, 经常举行宣教集会, 吸引了不少周围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 从而改宗伊斯兰教, 其中就有来自爪哇的穆斯林。[ 8 ] 可见, 伊斯兰教已在当地建立了广泛的基础。

随后, 伊斯兰教不仅在苏门答腊北部得到巩固和发展, 而且开始向其它的岛屿地区传播, 并渗入当地社会。在马来半岛东部, 伊斯兰教在 14 世纪已经传入, 丁加奴曾出土一块刻于 1303 - 1387 年间的有关伊斯兰法片断的石碑断片, 表明该地区已传入伊斯兰教。[ 9 ] 而北大年也在巴赛的影响下信奉伊斯兰教。[ 10 ]

在爪哇, 早在马六甲海峡开放前, 来自波斯和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商人就已在东爪哇沿海港口和巽他海峡的万丹居住了一个世纪以上。“13 世纪之后, 当印度洋贸易落入穆斯林手中, 不仅在爪哇北部, 而且在东南亚大多数港口的港务长都改奉伊斯兰教”, 并“通过他们, 伊斯兰教进入了宫廷”。[ 11 ] 满者伯夷宫廷遗址附近的特拉伍兰和特拉拉耶, 已发现了一系列的穆斯林墓碑, 特拉伍兰发现的墓碑年代最早的为萨加历 1290 年 ( 公元 1368 年 ), 其中除了一个例外, 它们的日期都是用萨加历而非伊斯兰教历, 意味着墓主必定是爪哇穆斯林, 而不是外国穆斯林。在特拉拉耶发现的墓碑年代最早的为萨加历 1298 年 ( 公元 1376 年 ), 碑上刻有《古兰经》引文和虔诚的惯用词句, 并且有精心制作的装饰, 显示墓主可能是非常高贵的爪哇人, 或许甚至是王族成员。[ 12 ]

此外,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对爪哇穆斯林社会有专门记载, 爪哇“国有三等人, 一等回回人, 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 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 食用亦美洁, 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在爪哇还出现了由伊斯兰教“贤人”传教的专门教区, 最早的教区革儿昔是由阿拉伯人莫拉纳·伊卜拉欣于 1400 年建立的, 到 1416 年左右, 还仅有人口千余家, 穆斯林大多是外国移民。[ 13 ] 但是到 16 世纪初, 已发展到 3 万穆斯林人口, 其中大多数是当地人。[ 14 ] 除此之外, 在基里、岸佩尔、杜板、扎巴拉、井里汶、泗水、三宝垄、南望、淡目等地都有类似的教区。它们既是穆斯林贸易的港口, 也是伊斯兰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随着穆斯林信徒的不断增长, 伊斯兰教影响日益扩大, 有的教区还发展成伊斯兰教政权, 如淡目王国, 它是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 5 ] <sup>(P255)</sup> 也是当时印尼群岛最强大的国家。从此, 整个印尼群岛开始处于伊斯兰教影响之下。在群岛西部, 伊斯兰教从马六甲依次传向婆罗洲西部、北部和苏门答腊西海岸传播; 在群岛东部, 伊斯兰教沿着爪哇岛的中部和东部的北岸, 传向班达群岛、安汶岛和摩鹿加群岛。到 16 世纪初, 除苏拉威西外, 伊斯兰教在印尼群岛占据了统治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 这也许是没有先例的”。[ 16 ]

在菲律宾, 1380 年前后, 阿尔·马赫敦首先把伊斯兰教传入苏禄群岛。1390 年, 苏

---

伊斯兰教长沙菲仪 (762-820 年) 创立的一派, 在法律解释上持“圣训”与“意见”并重的观点, 盛行于阿拉伯南部和印度尼西亚。

门答腊岛米南加保王子率一批文臣武士，来到苏禄的布万沙，传播伊斯兰教并建立了政权。1450年，来自苏门答腊巨港的阿布·贝克娶巴金达之女为妻，后又继承其岳父职位，自称苏丹，建立了苏禄苏丹国。1475年，阿拉伯人谢里夫·加本斯旺从柔佛率众来到棉兰老岛传教，并与当地的一位土著首领结婚，在棉兰老岛建立了苏丹国。[17]

在马来半岛，马六甲王国的兴起及其迅速成长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中心和强大的伊斯兰王国，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扩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六甲的伊斯兰化是在穆斯林商人影响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借助统治者自发引入伊斯兰教而形成。马六甲的伊斯兰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了穆斯林商人前来进行贸易活动。它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迅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中心，同时又是东南亚与东亚、西亚和南亚进行贸易交往的主要中转基地。随着马六甲地位的加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传播愈益迅猛。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随后西班牙人也占领了菲律宾的中北部地区。然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发展并未中止。马来半岛的柔佛、印尼群岛的亚齐和爪哇取代马六甲，成为16世纪东南亚岛屿地区推进伊斯兰化的三个主要中心。经过16世纪伊斯兰教势力的继续扩张和发展，它已遍及东南亚的主要岛屿，并不断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从而奠定了今日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基本格局。

## 二

然而，伊斯兰教为什么能够在东南亚岛屿地区得以成功传播？并且只是在13-16世纪的东南亚岛屿地区才发生这种重要的宗教改变呢？这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原因的。

第一，13-16世纪，马来群岛与马来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1、伊斯兰教充当反抗暹罗和满者伯夷（又称麻诺巴歇）帝国的思想旗帜，促进了新宗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有人指出：“在大多数国家里，伊斯兰教成为当地人民团结起来反抗信佛教的暹罗继续加强其统治的一面旗帜”。[18]<sup>(P110-116)</sup>进入15世纪，满者伯夷帝国开始衰落，帝国的地方长官和属国为了摆脱满者伯夷的统治，争取独立，便陆续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它为武器，展开反对信奉印度教、佛教的中央政权的斗争。1518年，以淡目王国为首的穆斯林王公势力灭掉了满者伯夷帝国。而拜里迷苏刺在创立了马六甲后，为了在其强大邻国暹罗的敌视下生存下去，一方面它寻求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还得到来自苏门答腊北部的巴赛、八儿刺等港口活跃的穆斯林商人的支持。马六甲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此外，占婆的伊斯兰化也是一个例证，占婆在它同印度教的印度的关系中断后，它与信佛教的暹罗和柬埔寨的传统关系也是消极的，其宗主国明代中国对它的屡次请求援助也未作出肯定答复。于是这个濒临绝境国家的首领为生存计，就转向与当地和周围的穆斯林保持密切的联系。

2、1511年以后，一个新的政治因素（包含着宗教因素）就是伊斯兰教作为反抗异教徒葡萄牙人的武器，反过来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步伐。西方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从1497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出现得到了最强烈的激励”。[18]<sup>(P113)</sup>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穆斯林得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入侵东南亚的目的之一，是继续反对摩尔人（即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战争。为了对抗葡萄牙人，他们加快了传播步伐。当时，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北部、文莱、菲律宾南部等地的王公贵族们均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向东南婆罗洲和马鲁古群岛传播。之后，又采取新的对策，即集中力量确保爪哇北部海岸的重要港口，以切断葡萄牙人与他们的潜在同盟者，即内地的印度教

- 佛教国的联系。例如，1522年，一艘葡萄牙船访问了巽他长拉巴，即帕亚查兰巽他王国的港口，并且和它的行政长官缔结了一个协定，允许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商馆。但5年之后，当葡萄牙人的远征队到达这里想建立商馆时，这个地方已经在穆斯林的手里，并完全伊斯兰化了。同时，伊斯兰教从爪哇北部港口，特别是淡目，传播到南婆罗洲和马鲁古群岛，这又比葡萄牙人领先了一步。在14-15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六甲帝国，也与信奉佛教的大城王朝在马来半岛展开争夺信徒的斗争。在这次竞争中，伊斯兰教也占据了优势，它不仅在北大年赢得信徒，而且在马六甲帝国衰落，泰国把半岛上的一些土邦置于属国地位后，居民仍旧信奉伊斯兰教。

3、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更是当地土著部族所乐于采用的一种新的巩固和扩展封建统治的理想模式。

第二，15世纪初，马六甲国王改宗伊斯兰教以及随着商业中心地位的形成，马六甲由王国发展成为独霸一方的帝国，为伊斯兰教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此，宗教除了作为信仰，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促进人们的商业意识，即一种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获权之欲望”，从而推动贸易的繁荣，一个又一个商业中心的出现，这在14、15世纪的东南亚也得到了证实。综观世界宗教传播的历史，其起始阶段不乏附属于商业和文化传播的过程。马六甲第二代国王满加特·伊斯坎德·沙在马六甲作为商业中心日益繁荣时，羡慕侨居马六甲的巴赛穆斯林商人的财富与权势，与巴赛苏丹的公主结婚，并信仰伊斯兰教。由于马六甲为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和位居要冲，王国很快取代巴赛成为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根据地。随着马六甲发展为帝国，伊斯兰教也紧随其商业扩张的步伐，由繁荣的港口及其周边向内地和其它岛屿扩散开来。半岛上的彭亨、丁加奴、吉兰丹、吉打和苏门答腊的罗康、坎帕尔、英德拉基里、锡阿克等小土邦都陆续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马六甲成为向帝国疆域以外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的中心。文莱通过与马六甲的贸易，接受了伊斯兰教；马六甲的商人和传教士还把伊斯兰教带给了苏禄和棉兰老岛。

第三，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简化等级关系，保护商业利益，限制高利贷和赈济贫民的教义，吸引了土著居民。同时，传入东南亚的沙菲仪教派，尊重当地居民习惯，也易为当地人接受。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马来群岛宗教繁多，大多带有多神教的性质，居民不仅崇拜多种偶像，还要缴纳繁多的宗教税，负担极为苛重。印度教还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分居民为四等。而伊斯兰教则提出了一种教条式的一神教信仰，这种一神教信仰能克服生活中许多混乱的现象，穆斯林对非教徒则处于优越的地位。它主张信仰真主安拉，赏罚分明，纳税以课功为主，居民负担较轻，并宣扬每个穆斯林都可以从真主那里得到一份可以自由使用和买卖的耕地，教义还宣布要限制高利贷和赈济贫民，更为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所欢迎。

同时，沙菲仪教派主张“当某种习惯在长时期内为所有的人所认可和承认时，这种习惯法也就成了‘逊奈’（圣训）。”[19]这种习惯法也被认为是穆斯林生活和行为的准则。传入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沙菲仪教派，他们在东南亚岛屿地区成功地宣扬关于伊斯兰教更加折衷主义和不那么严格的观点，也容忍和尊重当地人的习惯法，所以，对改宗伊斯兰教的条件，要求也不严格。“任何人只要愿意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穿戴，戒吃猪肉、戒酒和憎恨异教徒，便可成为穆斯林”。[20]因此，伊斯兰教得到迅速传播。例如，爪哇人不大关心履行伊斯兰教的拜功、斋月禁食与课功等；在文化上则注重爪哇的传统艺术，如皮影戏等。这不但不影响他们成为穆斯林，而且使爪哇成为东南亚伊斯兰教信徒最多的地区之一。

第四，沙菲仪教派以苏菲主义作为传播手段，迎合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民间神秘主

义的传统思想。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创立后，由穆斯林中的苦行主义者提出。起初苏菲主义提倡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宣扬禁欲主义，不承认外部世界，也掺入了一些坚定不移的、有戒律的伊斯兰教旨，成为一种以《古兰经》教义掩盖的调和论。后来在传播过程中又融合印度等国的神秘主义。当时，马来人所信奉的宗教都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人们强烈地相信“神力”。其根源在于万物有灵论，并具有真神就在身边的泛神论倾向。

[ 21 ] 伊斯兰教传教者的先驱们要在马来人中传播新宗教，除了尊重当地的习惯法外，还必须迎合当地居民的神秘主义倾向并显示伊斯兰教和真主的神力。因此，他们就以苏菲主义作为传教的手段之一。他们或者以穆罕默德托梦形式改宗伊斯兰教或者使用印度化形式与词汇同当地国王斗法，使国王皈依并允许他们在该地传播新宗教；或者借助魔术博取居民信仰。巴赛国王和马六甲国王便是通过（穆罕默德）托梦接受伊斯兰教的，[ 22 ] 伊斯兰教在婆罗洲东部的传播，则是两名传教士与古泰国王斗神力，使后者允许他们在该地传播伊斯兰教。

### 三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传播有其历史的必然，但也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完成的。首先，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穆斯林商人在经商的同时，还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影响。由于东南亚岛屿地区地处交通要冲，使其在当时的东西方贸易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穆斯林商人为了控制该地区的贸易和商品来源，借助于伊斯兰教，此时又处于传统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在东南亚开始衰落的时候，他们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进行传教：一是向东南亚的王公贵族劝说和鼓吹改宗伊斯兰教的好处。例如，提出信奉伊斯兰教不仅可以扩大统治权，还可以抵抗葡萄牙人的威胁；二是由旅居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影响来自群岛各地的商人，使他们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宣传甚至改宗伊斯兰教，并把新宗教带回故乡；三是通过穆斯林商人与当地居民通婚，留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后裔，形成新的穆斯林。例如，根据苏禄苏丹世系族谱（达尔西拉 Tarsilas）的记载，有一个叫塔恩·马沙伊卡（Tuan Mashaika）的穆斯林曾来到菲律宾宾群岛的霍洛岛，并与当地统治者的女儿结了婚，他们的后裔都取了穆斯林的姓名。马沙伊卡这个词是沙伊赫（Shaikh）的复数，意味着塔恩是阿拉伯圣者的后代。[ 23 ] 总之，穆斯林商人所带来的实际的商业利益，往往吸引并促使当地统治者主动接受伊斯兰教。

其次，通过来自阿拉伯和印度以及随后在本地出现的伊斯兰教传教士和学者在当地的的活动，提高和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或者在所到之处建立清真寺与伊斯兰学校，宣传与普及伊斯兰教的知识，或者与当地王公的女儿通婚，进而建立苏丹王国，并以麦加名义赐予伊斯兰头衔、圣旗与圣袍。例如，亚齐、万丹、马打兰、巨港和马辰等地土王都曾接受过伊斯兰学者赐予的圣物。

第三，由群岛先改宗的国家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建立穆斯林领地并逐步扩大直至建立苏丹国家，“伊斯兰化往往是伴随征服而出现的”。马六甲王国对彭亨、坎帕尔，爪哇马打兰王国对巴拉鲁干、布兰班甘，万丹对帕亚查兰，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迫使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那样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而进行的；这些斗争的根源也许更普遍地是王朝的、战略的和经济的。”[ 9 ]<sup>(P21)</sup>

第四，通过民间帮会的形式，秘密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教士在传播伊斯兰教时，除了尊重当地习惯法外，还利用苏菲主义迎合当地居民的神秘主义倾向，对那些不符合穆斯林正统的严格教规的各种民间习俗，采取容忍和宽大的态度，使伊斯兰教得以成功地传播。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特有的传播方式，也形成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岛屿地区独有的传播特点：

一是东南亚伊斯兰教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仅就印尼群岛而言，“印度西南海岸的马拉巴尔、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孟加拉、中国南部，当然以及阿拉伯、埃及和波斯，都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来源。”[9]<sup>(P18)</sup>马来半岛亦然，而“占婆的伊斯兰教是从中国传入的”。[24]<sup>(P168)</sup>

二是东南亚伊斯兰教具有广泛的兼容性。在马六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与待遇上差异较少。在承认真主“唯一”的同时，马来人将其原始宗教、印度教的某些内容以及传统习俗带入伊斯兰教中，如崇拜祖先；崇敬和祭祀某种物体，以求平安；“吠陀经”关于爱的咒文，通过简单附加一句关于信仰安拉的表白就合法化了；某些关于斋戒、教师、天堂和地狱等马来语词，都源出梵文等。作为伊斯兰教传播中心的爪哇同样也始终保有印度教、佛教和当地原有文化的成份，如“妇女有较高的地位，村社紧密团结，以及巫术、音乐、皮影戏、用魔法控制凶神、计算吉日、崇奉祖先神灵，包括崇奉他们在印度教和佛教雕像中的化身等等”。[24]<sup>(P171)</sup>

#### 参考文献：

- [1] 保罗·惠特利. 黄金半岛[M]. 高伟浓. 更变千年如走马[M]. 马来西亚：学林书局，1995. 256.
- [2] 赵汝适. 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M].
- [3] 新唐书：卷 222 下，诃陵传[M].
- [4] 廖大珂. 1511 年前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J]. 南洋问题研究，1995，(3)：17.
- [5] Slametmuljana, A Story of Majapahit[M], Singapore, 1976, p.218.
- [6] [新] 马来纪年[M]. 许云樵译注. 1982. 102-108.
- [7] 马可波罗游记[M]. 陈开俊等译注. 福建：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 207-208.
- [8] 伊本·白图泰游记[M]. 马金鹏译注.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536-537.
- [9] 梅·加·李克莱弗斯. 印度尼西亚历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7.
- [10] Abdullah, Taufik, Islam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 in Indonesia[M], Itinerario, Leiden, 1989. p.20.
- [11] Koentjaraningrat, Java Culture[M], Singapore, 1985, p.45.
- [12] M.C.Ricklefs, Islamization in Java: Four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A], In Ahmad Ibrahim, Sharon Siddique and Yasmin Hussain, Reading on Islam in Southeast Asia[C], Singapore, 1985, pp.36-37.
- [13] 马欢. 瀛涯胜览：爪哇国[M].
- [14] B.Schrieke,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M], Part one, The Hague, 1957, p.25.
- [16] S.Q.Fatimi, Islam Comes to Malaysia[M]. Singapore, 1963, p.93.
- [17] 金应熙. 菲律宾史[M]. 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45-46.
- [18] J.C.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A],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C], The Hague, 1955.
- [19] 里昂·马塞. 伊斯兰教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1.
- [20] Deliar Noer, The Modernist Muslim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00-1942[M], Kuala Lumpur, 1978, p.20.
- [21] R.O.Winstedt, The Malays: A Cultural History[M], London, 1950, p.38.
- [22] M.C.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M], London, 1981, pp.8-9.
- [23] Cesar Adib Majul, The Muslims in Philippine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Muslim Filipinos[M], Manila, 1974, pp.2-3.
- [24] J.F.Cady, Southeast Asia: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M], 1964.

[ 责任编辑：廖大珂 ]

( 英文摘要下转第 97 页 )

动态的共存”的观点，“华人应该以主动、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心态参与当地社会的发展”（第395页），鼓励华人既能认同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也能尽快地成功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社会。

作者对韩方明的“华人三重性”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三重性是五国华人的共性和本质特征，影响着各国华人的发展状况，从而对三重性理论用以阐释不同国家的华人问题加以验证。并以翔实的论证指出美国学者的“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忽视了华人和其他亚裔美国人为了成功所付出的更多努力、忽视了他们事实上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忽视了他们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仅未能正确反映亚裔美国人的现实，而且阻碍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这种理论是对华人和其他亚裔人的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

此外，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美国移民史研究、海外华人特性研究、华人移民政策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宏观上，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扩展了研究视野；在微观上，通过仔细分析研究对象的异同，深化了认识，得出的观点既富有新意又言之有据。

第三，密切联系实际。作者十分注意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侨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些可操作的构想。认为，我国不应该只是把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路引向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而应把潜在的中国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指出我国在鼓励留学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来去自由”的政策，认可新华人“为华服务”的新观念。还要加紧修改现行法律，制定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移民法，加强对外资和人才的吸引，并且要把侨务政策的重心转向新移民（第22-25页）。

国际移民和海外华人研究体系庞大、内容广泛，在一本书中要做到尽善尽美，实属不易。虽然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就整体而言，本书对国际移民和海外华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有益探索，是瑕不掩玉。例如，海外华人文化方面，本书的研究比较简略，只对华文教育做了详细探讨，而对海外华人的家庭伦理、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都有待于更多的关注。此外，本书偏重于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研究。人口流动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影响也是世界性的。如果能对其他国家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一些分析，也许更有助于世界人口迁移的研究。

[责任编辑：迟亚戈]

---

（上接第75页）

## The Spread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During the 13th-16th Centuries

Li Yi Ping

**Abstract:** Islam was spread successfully in Southeast Asian Islands during the 13th-16th Centuries by some special means as a result of profound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After further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6<sup>th</sup> Century, Islam had already been spread all over the main island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n it penetrated from the coastal area to the inland ceaselessly, which established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 for present-day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Islam; Southeast Asia; Islands; spread